

全球南方与世界文学的再想象

周 敏

摘要: 世界文学研究面临一个扩容悖论: 它越是努力纳入更多的南方文学、边缘文学, 就越是在巩固了一套需要被扩容的体制: 扩容预设了有待扩大的版图, 版图预设了划定边界的中心。达姆罗什的“流通”模式将“世界”预设为文学旅行的既定疆域, “折射”“翻译获益”“疏离式介入”等核心概念均以北方学院为隐含的参照系。“全球南方”虽具批判潜力, 但桑托斯的“知识生态”仍需“承认者”的位置, 米尼奥罗的“认识论脱钩”仍依附于中心—边缘的二元框架。格利桑的“全—世界”关系诗学以“关系优先于本质”“不透明性的权利”“颤动”三重命题置换了问题本身, 从“什么是世界文学”转向“世界文学如何发生”。其中, “克里奥尔化”概念以其不可预测性颠覆了“流通”的线性逻辑; “量的总体性”与“系统化的总体性”之辨揭示了“扩容”逻辑的实质; “在世界所有语言的在场中写作”将“不透明性”从伦理原则落实为语言实践。这一理论转向为中国比较文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万隆精神“求同存异”的辩证法出发, 可以探索南南流通研究、跨语际不透明性批评、群岛式比较视域等方法论路径, 重新理解“文明互鉴”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目标——追求的不是谁的文学流通更广的“力”(force), 而是在关系中属于所有参与者的“能”(puissance)。

关键词: 世界文学; 全球南方; 关系诗学; 格利桑; 自主知识体系; 文明互鉴

Abstract: Contemporary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face a paradox of expansion: the more they strive to incorporate Southern and marginalized literatures, the more they consolidate the very system that requires expansion—for expansion presupposes a territory to be enlarged, and territory presupposes a center that draws the boundaries. Damrosch’s “circulation” model presupposes “the world” as a spatial container; its key concepts—“refraction,” “gaining in translation,” and “detached engagement”—all implicitly take the Northern academy as their frame of reference. While the “Global South” carries critical potential, Santos’s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still requires a position of “recognizer,” and Mignolo’s “ecologies of knowledges” remains tethered to the center-periphery binary. Glissant’s Poetics of Relation in his Tout-Monde framework displaces the question itself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propositions—“relation prior to essence,” “the right to opacity,” and “trembling”—shifting the inquiry from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to “how does world literature happen.” Central to this displacement is Glissant’s concept of *créolisation*, whose radical unpredictability overturns the linear logic of “circulation”;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a “totality of quantity” and a “totalizing totality,” which exposes the essence of Damrosch’s

expansionist logic; and his claim to “write in the presence of all the world’s languages,” which grounds opacity as a concrete linguistic practice. This theoretical turn offers new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rawing on the dialectic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from the Bandung Spirit, it opens methodological paths including South-South circulation studies, cross-linguistic opacity criticism, and archipelagic comparative horizons, thereby redefining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wenming hujian) as an intrinsic method and goal of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one that pursues not the force by which literature circulates more widely, but the puissance generated in relation and shared by all participants.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Global South; poetics of relation; Glissant;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作者简介: 周敏, 文学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加勒比文学、文化理论与区域国别。电子邮箱: mindyzhou@126.com。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勒比文学史研究(多卷本)”(编号: 21&ZD274)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世界文学研究面临一个悖论: 它越是努力扩容, 纳入更多的南方文学、边缘文学、少数族裔文学, 就越是巩固了一套需要被扩容的体制。扩容预设了一个有待扩大的版图, 而版图预设了一个划定边界的中心。2024年, 奥斯陆大学以“去殖民化世界文学共和国”为题召集国际会议, 可见, 在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世界文学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1999)出版25年后, 她以巴黎为“世界文学之都”的想象^①仍然是需要解构的对象——这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论争至今仍悬而未决。

原因或许在于, 这些争论始终围绕着“谁有权定义世界文学”展开, 却很少去思考“定义”这一行为本身的逻辑。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流通”模式将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的名录转化为跨文化旅行的动态过程, 却未摆脱将“世界”预设为既定疆域的思路; “全球南方”的崛起带来了强有力的外部挑战, 却面临着将自身本质化、重蹈“第三世界”覆辙的风险。真正需要思考的, 不是定义权的归属, 而是一种特定的定义逻辑: 将世界文学设定为有待划定边界的客体, 由某个中心来确立其标准。这种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前提的本质化定义逻辑, 才是困境的深层根源。无论是北方定义南方, 还是南方定义自身, 只要这套逻辑不变, 权力的格局总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

^① 参见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困境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如果“自主知识体系”仅仅意味着用“中国经验”替代“西方理论”来定义世界文学,就不过是在定义权的争夺中增加了一个竞争者,而未触及上述逻辑本身。从中国比较文学方法论更新的内在需要出发,本文试图探讨:除了在定义权的争夺中增加一个竞争者,是否存在另一种思考世界文学的方式?

一、“流通”模式的深层困境

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种理论构想——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远读”^①、卡萨诺瓦的“文学共和国”、达姆罗什的“流通”模式——看似路径各异,实则共享一个未经审视的前提:“世界”是一个先在的空间,文学在其中被生产、被流通、被评判。莫莱蒂以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试图从宏观结构层面把握文学的全球流通规律,但其“远读”方法将文学简化为可量化的结构单元;卡萨诺瓦以巴黎为“世界文学之都”,将文学的全球分布解释为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竞争,但其图景以单一中心组织全局。相比之下,达姆罗什的“流通”模式最具综合性,它试图兼顾文学跨文化旅行的动态过程和具体文本的阅读经验,因此也最清晰地显露了“世界”概念预设的深层问题:将世界理解为文学流通的既定疆域。本节以达姆罗什为切入点,正是因为他的模式最具代表性,对其预设的追问也最能揭示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试图用“流通”概念重新定义世界文学。他的三重界定——“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折射”、“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收获的写作”、“世界文学不是固定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Damrosch 281-289)^②——构成了当代世界文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的历史贡献不容否认:它将世界文学从静态的经典名录转化为动态的流通过程,为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细加审视,这一模式在“世界”概念的深层预设上并非没有问题:它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先在的、有待填充、有待扩大的版图——将世界文学视为有待认识和归类的对象。在这一思路下,世界文学被预设为需要由某个中心来划定其边界、确立其标准;而无论由谁来执行这一“定义”,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力格局都不会变。这一问题在达姆罗什模式的两个关键层面清晰可见,并导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首先是“折射”(refraction)隐喻所隐含的权力预设。达姆罗什借用“折射”概念描述文学作品跨越文化边界时发生的变化,^③但“折射”强调的是

① 参见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2000): 54-68.

② 文中未标注译者的译文均由笔者自译。

③ 参见 Damrosch 283。

接收过程,而在当代全球化的文学流通中,主要的接收场所是北方学院——巴黎、伦敦、纽约的大学、出版社、批评机构。以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为例,达姆罗什指出,《瓦解》在西方读者中获得成功,部分归因于它被纳入西方读者熟悉的悲剧文类框架。^①这恰恰揭示了“折射”隐喻的症结:《瓦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被“折射”为非洲版的悲剧。但《瓦解》在非洲内部的流通、在加勒比和拉美读者中引发的共鸣,这些“世界性”的合法来源在达姆罗什的框架中缺席。文学的“世界性”被等同于“在北方的可见性”。

与“折射”隐喻紧密关联的,是“翻译获益”标准背后的价值预设。达姆罗什区分“从翻译中获益”与“在翻译中受损”的作品,将前者视为世界文学的核心。^②这一标准将“可译性”和“透明性”作为评判美德,事实上排斥了那些坚持地方性、抵抗翻译、维护文化不可通约性的作品。艾普特(Emily Apter)在《反对世界文学》(*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2013)中指出,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念建立在“可译性假设”(translatability assumption)之上,忽视了文学语言中“不可译”的维度。^③当“可译性”被视为文学的世界性通行证,那些拒绝变得“透明”、坚持自身文化不可通约性的文学实践,就被排除在世界文学的门槛之外。

此外,达姆罗什将世界文学定义为“不是固定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对超越自身时空的世界的疏离式介入”(Damrosch 281)。这里的“疏离式介入”(detached engagement)预设了一个拥有充分文化资本的读者:他/她能够在不同的文学世界之间自如游走,同时保持审美距离。当达姆罗什以歌德(Goethe)阅读中国小说、以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流亡伊斯坦布尔作为世界文学意识的范例时,他所指向的读者主体——无论多么世界主义——仍然是以欧洲知识传统为根基的。换言之,这种“阅读模式”隐含一个预设的世界文学读者,而这个读者的视野、训练和价值判断,是在北方学院中塑造的。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一问题尤为尖锐:即便中国文学获得了更多国际关注,如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谁有资格被纳入北方设定的名单,那么自主知识体系就无从建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批判针对的是“流通”模式的结构性预设,而非否定达姆罗什的学术贡献。他在后续著作中持续调整立场,更多关注南南流通和非西方文学传统,但只要“世界”仍被理解为有待扩大的版图,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力格局就不会因扩容而改变。张隆溪从不同角度对达姆罗什提出了批评:“流通”虽然是

① 参见 Damrosch 185。

② 参见 Damrosch 281-287。

③ 参见 Emily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Verso, 2013. 3-4。

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从作品本身的价值出发,因此他主张世界文学应该是对各文学传统中“尚待发现”的经典的探索。^①这一批评与本文的关切互补:张隆溪从文学价值维度指出了“流通”模式的不足,本文则从“世界”概念的深层预设追问其结构性问题。不过,“发现”这一隐喻本身也值得追问,它预设了一个已经存在但尚未被看见的对象,而世界文学的“世界性”是否确为一种等待被发现的既有属性?如果“世界性”的生成方式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那就需要从根本上反思“世界”概念本身。而在这一追问中,“全球南方”概念扮演着关键而矛盾的角色。

二、全球南方:批判潜力与自身困境

葡萄牙社会学家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长期致力于从全球南方立场批判北方知识霸权,是当代南方认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的“认识论杀戮”(epistemicide)概念揭示了上述困境的深层根源:殖民主义不仅摧毁了南方的政治经济体系,更系统性地摧毁了南方的知识体系。^②“流通”模式在无意中延续了这种“缺席”的制造:南方文学和南方理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双重缺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批判性概念框架进入了世界文学研究的视野。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区分“全球南方”概念的不同层次。在当前的学术与政治话语中,它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被使用:作为政治修辞与外交术语,指涉金砖国家、G20南方成员等集体身份;作为理论范畴,指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边缘位置;作为方法论,它表示的是从被边缘化的经验出发重新思考文学的世界性。本文主要在后两个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

像任何概念一样,“全球南方”作为理论范畴和方法论立场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2007年,洛佩斯(Alfred J. Lopez)创办《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期刊,明确指出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工具;^③德里克(Arif Dirlik)在该刊创刊号文章中指出全球南方的希望与困境并存:它既承载着重构全球秩序的可能,又面临被新自由主义逻辑重新收编的风险;^④同年,康奈尔(Raewyn Connell)出版《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① 参见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国际比较文学》7.1(2024): 5-17。

② 参见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4. 92-117。

③ 参见Alfred J. Lo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1.1 (2007): 5。

④ 参见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1.1 (2007): 12-23。

2007),系统批判社会科学的北方中心主义,论证南方社会自身产生的理论同样具有普遍意义。^①此后十余年间,这一概念在文学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为具体的方法论框架:马勒(Anne Garland Mahler)的《从三大洲到全球南方》(*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Race, Radic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2018)和《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2021年特刊将全球南方确立为一种从被边缘化的位置出发重新思考文学世界性的方法论立场;^②韦斯特-帕夫洛夫(Russell West-Pavlov)主编的《全球南方与文学》(*The Global South and Literature*, 2018)则将研究重心从纵向的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转向南方国家之间长期存在却被忽视的“横向关系”(lateral relationships)。^③

然而,“全球南方”概念自身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豪格(Sebastian Haug)等人指出,“全球南方”在实际使用中极易滑向地理本质主义,忽视南方内部的巨大差异。^④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全球南方”仍然是在与“北方”的对照中定义自身——如果“全球南方世界文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北方对等的中心,那它就陷入了用新的普遍性替代旧的普遍性的陷阱。马勒对此有过警告:不加批判地使用全球南方范畴,可能会强化而非消解我们试图批判的等级结构。^⑤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南方”正在被国际学术市场迅速吸纳为新的话语资本,反霸权的姿态本身变成了可消费的学术商品,批判能量在知识产业的运作中被重新编码。殷之光从更深的认识论层面揭示,北方的本质主义认识论框架试图将“全球南方”这一动态概念强行固定为具有类似内在属性的国家集合,这种“哲学贫困”(4)本身就是需要克服的认识论障碍。

蒋晖从非洲文学的实证考察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南方文学的现实困境:当下南方文学仍然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⑥这一“三重隔离”恰恰印证了“全球南方”概念从批判话语滑向分类标签的风险。如果南方文学的生产、流

① 参见Raewyn Connell.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2007.

② 参见Magali Armillas-Tiseyra and Anne Garland Mahler. “Introduction: New Critical Directions in Global South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8.3 (2021): 465.

③ 参见Russell West-Pavlov. “Toward the Global South: Concept or Chimera, Paradigm or Panacea?” *The Global South and Literature*. Ed. Russell West-Pavlo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10.

④ 参见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u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42.9 (2021): 1926.

⑤ 参见Anne Garland Mahler. *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Race, Radic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⑥ 参见蒋晖:“全球南方文学的大众文艺方向”,《东方学刊》1(2025):2-15。

通和接受仍然受制于北方的文化资本逻辑,那么“全球南方文学”就可能只是原有等级体系中新增的一个门类。这些批判触及了“全球南方”的根本悖论:它既是去本质化的(强调边缘位置而非本质属性),又容易被重新本质化(将南方想象为同质的整体)。这一悖论能否在全球南方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决?我们看一下全球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论。桑托斯提出的以“知识生态”(ecologies of knowledge)为核心的认识论多元方案,试图通过承认多种知识形式的并存来回应本质化风险。^①然而,“多元主义”仍然需要一个“承认者”的位置——谁来判定哪些知识是“合法”的?定义者的逻辑并未被消解,只是定义者变得更加宽容。解殖民理论家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的“认识论脱钩”(Mignolo 1)则走得更远,主张从现代性的“外部”——被现代性边缘化的知识传统——重新思考世界。但“脱钩”预设了一个有待“脱离”的中心——“现代性/殖民性”——因此仍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运作。“脱钩”是对中心的反应性否定,而非对“中心—边缘”格局本身的超越。这两条路径的共同局限在于:它们仍然在“谁有权定义世界”的框架内运作。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的不是换一个主体来定义世界文学,而是从根本上反思将“世界”视为有待划定的版图这一思路本身。马提尼克思想家爱德华·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 1928-2011)从加勒比这一全球南方的独特位置出发,提供了超越这一困境的可能。他的回应并非用“南方”来定义世界,而是从根本上置换了“定义”的逻辑。正如沙穆瓦佐所精辟概括的那样:“他的叛逆,我指的是他的思想”(Glissant and Chamoiseau 9)——格利桑的“叛逆”不是否定性的反抗,而是思想范式本身的转换。

三、“全—世界”:在关系中重新想象世界文学

作为法属加勒比马提尼克的理论家,格利桑的理论乃是从大西洋奴隶贸易和种植园殖民的历史创伤中生长出来的,这使他的思想同时具有存在论的深度和伦理的迫切性。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对格利桑思想展开了不少研究:高方、黄可以从文学空间观的角度分析了群岛思想与关系诗学的内在关联;^②刘成富则从符号学视角梳理了格利桑从“群岛思想”到“多元世界”的文化身份理论谱系。^③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想追问的是,格利桑的思想能否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一种不同于“批判北方”的路径?如果桑托斯和

① 参见 Santos 185-211。

② 参见高方、黄可以:“群岛思想与关系诗学——论格里桑的‘全-世界’文学空间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2022): 43-51。

③ 参见刘成富:“爱德华·格里桑‘世界性’文化身份理论探寻”,《外国文学研究》6(2023): 119-127。

米尼奥罗的困境在于仍然以“定义权”为争夺对象,那么格利桑是否触及了更根本的层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入格利桑关系诗学的内部。

格利桑1990年出版的《关系诗学》(*Poétique de la relation*)提出一种以关系为根基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从三个方面不同于桑托斯和米尼奥罗的路径。

首先是关系优先于本质的认识。身份不是先于关系而存在的本质,而是在关系中不断生成的过程。格利桑强调,正是在与他者的交换中,人们得以改变,同时又不失去自身。^①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文学的“世界性”不是某些作品的固有属性,而是在跨文化相遇中生成的事件。比较文学学者谢永平(Pheng Cheah)从不同路径抵达了类似洞见:他主张“世界”首先是时间性的生成过程而非空间性的既定存在,世界通过“世界化”(worlding)不断生成。^②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格利桑与达姆罗什的根本分歧:达姆罗什将“世界”理解为文学流通的空间:世界在那里等着,文学进入其中;格利桑将“世界”理解为关系的生成:世界在文学的每一次跨文化相遇中重新发生。格利桑用以描述这一生成过程的核心概念是“克里奥尔化”(créolisation)。他特别区分了“克里奥尔化”与“混血”(métissage):混血的结果可以预见,克里奥尔化的结果则根本不可预测。克里奥尔化“从不固定,从不停止,从不铭刻于本质或身份的绝对之中”(Glissant 1997b: 26; 2020b: 14)。这一区分对世界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达姆罗什的“流通”预设了可追踪的路径和可预见的接收效果(“折射”),克里奥尔化则从认识论上颠覆了这种线性逻辑——文学的跨文化相遇不是从A到B的旅行,而是A与B相遇后产生了无法事先规划的C。

其次,在关系中,差异如何保持自身而不被消融?格利桑用“不透明性的权利”(le droit à l'opacité)回应这一追问:“不仅仅同意差异的权利,更进一步,同意不透明的权利,这种不透明不是封闭在不可穿透的自给自足中,而是存续于不可化约的独特性之中”(1997a: 190)。这一权利直接挑战了启蒙主义以来的透明性理想。殖民主义的暴力之一,就是要求被殖民者变得“透明”“可理解”;而格利桑所捍卫的,正是坚持不被轻易翻译和归类的权利。^③他进而在语言层面展开这一主张,在1996年出版的《多元诗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une poétique du divers*)中宣称“我在世界所有语言的在场中写作”(1996: 112; 2020a: 23)。格利桑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通晓所有语言,而是意味着“我不再能以单语的方式写作”(同上):他意识到世界语

① 参见 Glissant 1997b: 178; 2020b: 110。

② 参见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③ 参见 Glissant 1997a: 189。

言之间存在着支配、共谋、吸收、压迫、侵蚀、接触等关系所构成的巨大悲剧，自己的语言不可能置身事外。^①这一主张与前文所批判的达姆罗什“翻译获益”标准形成了精确对照：达姆罗什将“可译性”视为文学通往世界的通行证；格利桑则认为真正的世界性写作恰恰诞生于对语言间不可化约之差异的清醒意识中，不是让语言变得透明以便流通，而是在语言的不透明中触及世界的真实。

第三点与差异相遇时最内在的动力学有关，格利桑称之为“颤动”（tremblement）。不同于对话主义追求的和谐共识，格利桑承认差异相遇必然带来冲突与不可预测性，“世界在颤动，而非收敛”（Glissant 1997b: 97）。在与策展人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的对谈中，格利桑进一步阐明：“颤动思维”不是不确定性或恐惧，而是一种拒绝一切固定的、帝国式思维范式的本能，是在徘徊与探寻中与世界建立真实连接的方式。^②世界文学的活力恰恰来自这种“颤动”，来自不同文学传统相遇时产生的震荡与共振，而非流通终点上的经典化确认。

关系优先、不透明性、颤动，构成格利桑关系诗学理论的基础，但这三重命题并非从抽象原则推演而来，而是在文学实践中率先获得了具体展现。1993年，格利桑出版小说《全-世界》（*Tout-monde*），以碎片化的叙事结构讲述马提尼克家族跨越几代人、横跨加勒比与欧美的流散经历。^③小说没有单一主人公，没有线性情节，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时空在文本中交织碰撞。这部小说本身就是关系诗学的文学实践：多声部叙事拒绝统一主体（关系优先于本质）；叙事片段不追求被整合为透明的总体意义（不透明性）；不同时空的碰撞产生不可预测的震荡（颤动）。小说先于理论体系化这一事实本身具有方法论意义：理论从文学经验的关系中涌现，而非先于经验被设定。1997年，格利桑出版《全-世界论》（*Traité du Tout-monde*），将文学实践系统化为理论体系，提出“全-世界”是“量的总体性”，抵抗所有“系统化的总体性”（176），并将“世界性”（mondialité）与“全球化”（mondialisation）对立：前者是差异在保持自身前提下相互联结的过程，后者是资本驱动的同质化扩张。^④格利桑敏锐地意识到“总体”概念本身的危险：“作为总体性的世界，与极权主义危险地接近”（1997b: 194; 2020b: 73）。如果我们把自身所处的特定位置变成一种排斥，那么这种总体性就真的会沦为极权主义，但如果我们建立关系，就能让每一个具体地方的丰富质地与所有地方的丰富质地相互

① 参见 Glissant 1996: 112-113; 2020a: 23-24。

② 参见 Édouard Glissant and Hans Ulrich Obrist. *The Archipelago Conversations*. New York: Isolarii, 2021. 22-23。

③ 参见 Édouard Glissant. *Tout-monde*. Paris: Gallimard, 1993。

④ 参见 Glissant 1997b: 192。

关联。格利桑由此明确拒绝了从特殊中抽象出普遍的旧路径,并声称:“从某一特殊性中抽象出一种普遍性,这不再能打动我们”(Glissant 1997b: 194; 2020b: 73)。这一判断对本文的论证至关重要:达姆罗什的“扩容”逻辑本质上是一种“系统化的总体性”,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文学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学”版图;而格利桑的“全-世界”是“量的总体性”,差异共在,而非被整合为一。他还以“群岛思维”(pensée archipélique)取代西方的“根源思维”(pensée de racine):不是树状的、等级化的结构,而是网络化的、多点起源的结构。“群岛”这一隐喻来自加勒比本身,数十个岛屿散落在海域中,没有中心,没有主宰,每一个岛屿都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同时又通过海洋相互联结。^①在《全-世界论》中,格利桑更明确地将群岛思维定位为对西方“大陆式”系统化思想的替代:“群岛思维契合我们世界的节奏。它具有我们世界的模糊性、脆弱性和漂移性。它接受迂回的实践,这不同于逃避或放弃”,因为“那种辉煌的系统化思想”——即以往统治人类共同体历史的等级化知识范式——“对我们的喷发、我们的历史和我们同样辉煌的漫游不再适用”(1997b: 31; 2020b: 18)。黄可以从混杂性、多样性与开放性三个维度解读了群岛思想的内涵,指出其核心在于揭示每种文化“海面之下”的联结部分,凸显文化存在中蕴含的丰富异质因子。^②在国际学术界,卡比尔(Ananya Jahanara Kabir)近来将格利桑的群岛思维与克里奥尔化概念发展为一种跨区域方法论,主张通过“碎片的群岛”(archipelago of fragments)将海洋、海岸线与内陆置于非等级化的关系中,以此重新激活克里奥尔化的记忆。^③

关系诗学如何改变我们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阅读?将《全-世界》与《瓦解》对照可以得出答案。在达姆罗什的框架中,《瓦解》的“世界性”依赖于一条可追踪的流通路径,即从尼日利亚到伦敦和纽约,通过悲剧文类框架被西方读者辨认和接受。但《瓦解》在加勒比读者那里也引发共振,一个同样经历过殖民入侵和文化崩溃的区域,其读者从奥孔夸的悲剧中辨认出的不是普遍的人类命运,而是殖民暴力造成的具体的文化断裂,其在“折射”框架中没有位置,因为“折射”模式只关注作品抵达特定接收场域后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不追问作品在不同文化间产生的横向的、非等级化的关系性共振。格利桑的小说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案例,叙事在马提尼克、法国、意大利、美国之间跳跃,时间在殖民史与当代之间折叠,多个叙述者的声音彼此交叉而不汇合为统一的“故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海洋意象——连接岛

① 参见 Glissant 1996: 31。

② 参见黄可以:“混杂、多样与开放——试论格利桑‘群岛思想’的内涵与价值”,《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3(2025): 85-95。

③ 参见 Ananya Jahanara Kabir. “The Creolizing Turn and Its Archipelagic Direct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 10.1 (2023): 90-103。

屿的同时保持岛屿间的距离——构成了“关系”的空间隐喻。人物在“根源”与“漂泊”之间不断协商身份,但格利桑拒绝将这种协商解读为创伤的复演或同化的完成,而是呈现为持续的“生成”:身份在每一次跨文化接触中被重新塑造,却不曾被固定。这里的“世界性”不依赖于作品在巴黎或纽约的接受度,而是在文本内部就已经通过差异之间的关系性编织而“发生”了。

两个文本的对照揭示了一个关键差异:“流通世界性”将文学的世界性视为外在于文本的属性,作品自身不具有“世界性”,它的世界性取决于它被谁接受、在哪里流通;“关系性世界性”则将世界性理解为文本内在的关系,世界性在差异的碰撞中生成,而非在流通的终点被确认。这里还隐含着更深层的分歧:达姆罗什将世界文学定义为“阅读模式”,预设文学活动是在既定制度框架中对既有文本的接收;而格利桑在《全-世界论》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文学本体论:“写作就是说出世界”(Glissant 1997b: 119; 2020b: 73)。写作不是在世界中流通的产品,而是“说出世界”的行为本身,是“唤起世界之滋味”(同上)的实践。

当然,承认关系诗学的理论力量,并不意味着对其局限视而不见。关系诗学改变的是认识论框架,而非政治经济现实。在一个流动性受阻、边境日益森严的时代,“全-世界”的理念是否不过是一种幻象?关系诗学所提供的是一种重新理解世界文学的认知方式,而非一套改变全球文化权力格局的政治纲领。但认识论框架的改变恰恰是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所能做、也应当做的事。文学之于世界秩序的独特价值,不在于直接改变政治经济结构,而在于它有能力在既有的等级空间中打开另一种想象,让被“流通”逻辑排除在外的关系变得可见。正视这一落差,不是否定格利桑,而是拒绝将他的思想简化为乌托邦口号。“全-世界”的批判生产性,恰恰在于它对现实的诗性拒绝,而非仅仅描述现实。格利桑与沙穆瓦佐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中将这一立场概括为“诗性政治”(une poétique de la politique):真正的政治不是对现状的管理,而是想象力的解放——“在日常必需品的散文之上,浮现的是赋予存在以意义的本质,即诗性”(Glissant and Chamoiseau 83)。文学研究所改变的认识论框架,本身就是一种诗性政治的实践。

四、世界文学再想象的方法论路径

我们从“流通”模式的困境出发,经由“全球南方”的批判潜力与限度,抵达了格利桑关系诗学所打开的思想空间。这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实践有何意义呢?

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思考有着自身的问题脉络。王宁将世界文学理解为“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39);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追问

作品在文化穿行中“生成”了什么,把文化接触中的变异视为意义的生产而非损耗,^①与格利桑的“克里奥尔化”构成了理论对话;金惠敏的“间在解释学”论证世界文学的本质在于传统“之间”的生成性空间,^②宋炳辉则从语言地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路径,主张世界文学是“一个不断衍生的复数,一种创造性的、跨文化的、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和文学事件”(20),这一判断与格利桑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在关系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形成了深层呼应。在更深的认识论层面,胥涛近来提出“全球南方”的真正潜力在于推动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不仅要求重新审视知识的内容,更要求反思知识生产的结构本身。^③与此同时,高方、黄可以以格利桑的“全-世界”文学空间观出发,将群岛思想与关系诗学作为分析世界文学空间的批评视角。^④这些探索表明,中国学界已在不同维度上触及了“世界文学如何发生”这一问题。

在更深的历史层面,万隆精神的遗产为关系诗学的世界文学构想提供了实践性根基。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⑤方针蕴含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法:“同”不是预先给定的共同本质,而是在承认“异”的前提下通过对话不断生成的共识。这与格利桑的“克里奥尔化”不仅在精神上相通,更具有方法论上的同构:两者都拒绝预设同一性,都把差异视为联结的前提而非障碍。但历史的教训同样发人深省,“第三世界”概念逐渐被本质化,到20世纪末几乎沦为“贫穷”“落后”的同义词。任何解放性概念,如果缺乏持续的批判性反思,都可能从工具变成枷锁。赵汀阳在《天下体系》(2005)中将“天下”重构为“无外”的政治哲学,^⑥与格利桑“全-世界”拒绝任何中心的立场形成了呼应。但共鸣之下的差异不可忽视:格利桑的“无中心”是殖民暴力造成的“去根”(déracinement)之后的重建策略,始终带有断裂与颤动的印记;而“天下”根植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经验,其“无外”预设了文化传统的自我延伸能力。这种差异本身恰恰说明,“世界性”的发生并非遵循单一路径。

但如果这些资源之间只停留在类比层面——“都重视差异”“都反对中心”——还不足以构成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国比较文学需要回答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何在不落入“中国中心”的前提下,提出具体的方法?基于

①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参见金惠敏:“间在解释学与世界文学”,《探索与争鸣》8(2022): 126-134。

③ 参见胥涛:“全球南方与认识论的革命”,《世界社会科学》6(2025): 1-21。

④ 参见高方、黄可以 43-51。

⑤ 周恩来于1955年4月19日在万隆亚非会议补充发言中提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参见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6-128页。

⑥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45页。

前文的理论分析,至少有三个方向值得探索。

首先是南南流通研究。不再仅仅研究南方文学如何被北方接纳,而是系统考察南方文学传统之间的横向联结,如加勒比文学在非洲的接受、拉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这类研究的关键在于,不以北方学院的经典化标准作为衡量“世界性”的尺度,而是追踪作品在不同边缘化语境之间产生的关系性共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瓦解》在加勒比读者中引发的共鸣,即基于共享的殖民断裂经验而非北方学院赋予的“悲剧”文类标签,恰恰是“流通”框架所无法捕捉的“世界性”。南南流通研究要做的,正是让这类横向的、非等级化的文学关系成为研究的正当对象,而非达姆罗什式“折射”路径上的残余。其次是跨语际不透明性研究。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在言外”与格利桑的“不透明性”并非简单的类比:前者是美学上的自觉选择,言说的克制不是意义的匮乏,而是对意义溢出的信任;后者是被殖民者拒绝在殖民者凝视下变得“透明”的生存策略。但两者的深层关联在于:它们都拒绝将“可理解性”作为文学价值的前提。由此可以发展一种跨语际的不透明性批评,考察不同文学传统中“抵抗翻译”的方式如何从完全不同的经验中生长出来,又如何在跨文化接触中相互照亮。此外还有群岛式比较。格利桑的“群岛思维”提示我们,比较文学的基本单位不必是“民族文学”,也可以是跨越国族边界的关系性区域,如加勒比群岛、东南亚海域、环印度洋文化圈。这种比较视域不预设中心,每一个“岛屿”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同时通过“海洋”,即跨文化接触的历史来相互联结。以加勒比文学研究为例,如果不以“英语加勒比文学”“法语加勒比文学”“西语加勒比文学”的语种分类为基本框架,而是以种植园经验、中间航路记忆、克里奥尔语言实践等共享的历史经验作为比较的纽带,就有可能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民族文学叠加的“世界性”。

在更深的层面上,上述三条路径共同指向的是“文明互鉴”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目标。“互鉴”之所以不同于“流通”,在于它内含了关系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要求:“鉴”是在他者身上照见自身未曾意识到的东西,前提恰恰是承认他者有不可被完全理解的部分;“互”则意味着关系是双向生成的,而非一方被另一方“折射”。如果说达姆罗什的“流通”模式描述的是文学在既定疆域中的单向旅行,那么“文明互鉴”所指向的则是不同文学传统在相遇中彼此照亮、相互改变的过程。南南流通研究追踪的是被北方视野遮蔽的“互鉴”实践,跨语际不透明性批评守护的是“互鉴”中不可化约的差异,群岛式比较视域提供的则是让“互鉴”发生的非等级化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格利桑与沙穆瓦佐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中反复区分了“力”(force)与“能”(puissance):“只有在关系中才有真正的能,而这种能属于所有人”(Glissant and Chamoiseau 78)。“流通”模式关注的是“force”

——谁的文学流通得更广、被更多学院接受;“文明互鉴”追求的应当是“puissance”——在关系中生成的、属于所有参与者的创造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较文学的“自主”不是封闭,而需要在“互鉴”中建构,在与世界各文学传统的平等对话中生成自身的位置,同时也为对方提供重新认识自身的镜鉴。

结 语

格利桑说“写作就是说出世界”(Glissant 1997b: 119; 2020b: 73)——这里的“世界”不是一个等待被描述的对象,而是在“说出”的行为中才得以涌现的东西。如果“世界”具有这种本体论上的生成性,那么世界文学研究就不只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生产,它本身就参与“世界”的创造。由此可以更深地理解“文明互鉴”的意涵:“互鉴”不是两个已经完成的文明之间的相互观赏,而是在阅读、翻译、批评的实践中,双方都进入一个尚未存在的关系空间,在那里各自发现自身未曾意识到的东西——“世界”正是在这一刻发生的。中国学者从事加勒比文学研究、非洲文学研究、拉美文学研究,就不只是在“认识”一个已然存在的学术对象,而是在以自身的阅读实践参与一个“世界”的生成。而这个“世界”的面貌,取决于我们选择与谁建立关系、以何种方式建立关系。然而,“世界的观念已不再足够”(同上)。格利桑提醒得好,我们需要的不是关于世界的更好理论,而是对世界之“滋味”的感知。^①“滋味”在此意味深长:它是感性的而非概念的,是在接触中才能获得的而非可以远距离描述的,是每一次都不同的而非可以一劳永逸地把握的。世界文学研究如果能够从“定义世界”走向“品尝世界的滋味”,在每一次跨文化阅读中让自己被改变,同时也在改变他者对自身的理解,那么“世界”就不再是有待填充的版图,而是在无数次相遇中持续涌现的关系本身。世界文学的未来,或许就在于把这一信念从诗学转化为实践,在每一次跨文化相遇中,既改变他者,也被他者改变,而在这种相互改变中,“世界文学”才真正发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Glissant, Édouard. *Introduction à une poétique du divers*. Paris: Gallimard, 1996.
---. *Introduction to a Poetics of Diversity*. Trans. Celia Britto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20a.
---.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 Betsy W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a.

① 参见 Glissant 1997b: 119。

- . *Traité du Tout-monde*. Paris: Gallimard, 1997b.
- . *Treatise on the Whole-World*. Trans. Celia Britto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20b.
- Glissant, Édouard and Patrick Chamoiseau. *Manifestes*. Paris: La Découverte / Éditions de l'Institut du Tout-monde, 2021.
- Mignolo, Walter D.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宋炳辉：“世界文学的语义分析及谱系研究的可能性”，《探索与争鸣》6(2024): 17-22+177。
- [Song, Binghui. “Semantic Analysi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enealogical Study” (shi jie wen xue de yu yi fen xi ji pu xi yan jiu de ke neng xing).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6(2024): 17-22+177.]
- 王宁：“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外国文学研究》5(2018): 39-47。
- [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s an Issued-Driven Concept” (zuo wei wen ti dao xiang de shi jie wen xue gai ni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8): 39-47.]
- 殷之光：《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6年。
- [Yin, Zhiguang. *Global South: Building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quan qiu nan fang: gou jian shi jie zhi xu de wei lai). Beijing: CITIC Press, 2026.]
-

(上接第 57 页)

- Wulf, Andrea. *Founding Fa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atur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1.
- 周敏：“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加勒比身份叙事——以《抵达之谜》为中心”，《外国文学》3(2023): 55-65。
- [Zhou, Min. “A Narrative of the Caribbean Identities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With *The Enigma of Arrival* as the Focus” (zuo wei she hui xiang zheng xing wei de jia le bi shen fen xu shi: yi di da zhi mi wei zhong xin). *Foreign Literature* 3(2023): 55-65.]